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珍妮姑娘

美国作家惠特曼著
傅东华译



一八八一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大旅馆里，到帐房的写字台面前，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绵软多肉的体格，一张坦率开诚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顺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缩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视，这种神情是谁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贫穷正在逼迫她们。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连那帐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问。

“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见这句话，就觉得不舒适地转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烦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们贫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帐房倒有些侠气，他看见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可见得她们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请呆一会儿，”他说了，就走进背后一间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馆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

“是的，我想总是的。”

“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话。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

“你去见管事长去，”帐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说。“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

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说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身一家的悲剧的顶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给他的那一点东西维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轩——他的同伴们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货车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礼拜只有四块钱的收入。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纪已过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训练。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纪太轻，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问题更难解决罢了。他们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经为了一笔六百块钱的借款押给人家，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债，为的是他积下的钱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顺，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点点储蓄用得精光，就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诊费，房子

的利钱，还有欠肉店的，欠饼店的，虽则人家晓得他诚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打发他们上学，给他们缝缝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

旧店家赊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赊货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赊给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礼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们拿着桶子和篮子从附近铁路站场的轨道网里捡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场里拾得来。这样的，他们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径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觉得绝望了。

“我得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顽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说的一句话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表现。

真是祸不单行，刚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是会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地替她祈祷。爱温吉医生纯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给那孩子认真的诊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给她安慰。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径悲悲切切地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险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轩的工资都已经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项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们也已经有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绝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钱？”女管事问她。

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说的，可是她既有需要，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钱一天不太多吗？”

“不多，”管事说；“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

“很好，”葛婆子说。“今天就开头吗？”

“好的；现在你跟我来吧，我指给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

她们这么草草被介绍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好地点，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至少科伦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规模很宏大，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议事厅和大店铺都在那里。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新近重新装饰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径都光耀夺目。有一张庞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专设一个卖报纸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

的地方，就是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个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较暂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及到去擦台阶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妃甫低声的说着，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其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

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磨擦，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辛勤劳苦，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

经过大旋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蔼然的挥着手，等于说，“不消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接触着他的视线，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鞠了个躬，欣然地微笑了。

“你不必劳驾，”他说。

微微的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

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迷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走过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象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不乐意的。”

珍妮又默默地工作起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官感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听它。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拿忧虑去充塞她那青年的心。她无时不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深愿自己也得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几座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触起日间因见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动的那种朦胧的情绪。

“有钱不很适意吗？”她说。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的味罗尼加。

“你看见旅馆里多么大一间饭厅吗？”

“看见的。”

她们经过一些低矮的草房，在零落的枯叶里走着。

“我巴不得咱们也有钱，”珍妮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可不知道怎样才好呢，”她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相信家里还有一点东西可吃的。”

“咱们再去看看包门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起了。

“你想他还肯相信咱们吗？”

“咱们去对他讲明咱们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会去对他讲的。”

“好吧，”她的母亲疲倦地说。

离开她们的家两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她们怯生生地冒险走进去。葛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

“今儿晚上您肯给我们一点面包和咸肉吗？我们这会儿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礼拜六一准给你线。”

“是的，”葛婆子补充说，“我现在有事儿做了。”

包门是她们家里还没有病人也还不觉得困苦的时候跟他们做生意好久了

的，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

“你们在那儿做工多久了？”他问。

“刚刚今儿下午。”

“您总知道的，葛奶奶，”他说，“我是怎么个景况。并不是我不肯。葛先生是没有错儿的，可是我自己也穷。日子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的。”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虚弱地说。

她那旧绒线打的围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红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勉强闷着嘴站在一旁。

“好吧，”包门先生最后说，“我想这回是可以的。礼拜六可得请您尽快归还我。”

他把面包和咸肉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挖苦的语气说道：

“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去作成别处的生意了。”

“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说，“您有不知道的吗？”可是她有些心慌，不敢再谈下去了。

她们踏进那阴沉沉的街道中，沿低矮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将近门口的时候母亲疲倦地说，“他们有煤拿回来没有。”

“你别操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拿，我会去拿的。”

“有一个人赶走我们呢，”当母亲问起煤的时候，这是那心慌意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话。“我可也拿到一点儿了，”他又说。“我是打一辆车子上扔下来的。”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味罗尼加怎么样？”她问。

“她好象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又给她吃过药。”

一顿菲薄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熬夜。

吃饭的时候，西巴轩提出一个建议。他是在社会上和商业上有较大的经验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不过是一个造车匠的艺徒，而且除开他所竭力反对的路得教义外不曾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饱和着了美国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十分相称。他显得魁梧、勇武，以他的年龄而论相貌要算不错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种人生哲学，以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必须去结交体面社会的头等重要人物，至少要装得同他们结交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青年老喜欢到科伦坡旅馆一带去走动走动。他觉得这个旅馆就是社会上一切有身分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一有钱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同三朋四友站在旅馆门前，闲荡着，衔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掸拂掸拂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同道的，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浮浪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们。凡是这一流的人，都是他所羡慕而要去同他们比赛的。衣服是主要的试金石。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别针，那么无论他们怎样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要做这一流的人，要学这一流人的行径，因此，他那游荡生活的经验就很快地增广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洗？”他等珍妮说了那

个下半天的经历之后就问她。“这个该比擦楼梯好些。”

“怎么个要法呢？”她回问。

“怎么，自然去问那个帐房咯。”

珍妮觉得这个计划很有价值。

“要是你在那儿看见我，可别跟我说话，”一刻儿之后他又背着人告诫她。“你别露出认识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

“唔，你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先前已经说过，她们这么一副穷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看不见好了，听见吗？”

“好吧，”她柔顺地回答，因为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到一岁，可到底是哥哥，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到旅馆里去，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

“巴斯说咱们可以问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洗。”

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的三块钱的问题想过了一夜，可解决不了，所以就赞成这个主意。

“这是可以的，”她说。“我去问那帐房去。”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时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傍晚，这才碰巧得很，女管事差她们去擦帐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了。那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酝酿了整个下午的那个问题怯生生地冒险提出时，他就耐心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她说，“会给我东西洗吗？那我要谢他不尽的。”

那帐房把她看了看，认出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已极的神情。

“让我想想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想来乐意帮助贫穷的女子。“你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继续说。“他在二十二号里，拿这个去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说是我叫你去的。”

葛婆子感激得发抖，接过卡片来，眼睛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就这么行了，”那帐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说。“你马上就上去。这会儿可以在他房间里找到他的。”

葛婆子怀着满腹狐疑去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的站在她旁边。

一会儿门开了，满室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议员先生。他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比他们初次会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

“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小的；“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那母亲很觉羞惭，嗫嚅着回他的话。

“我们来问问，您有什么赏我们浆洗的没有？”

“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重述她的话。“浆洗的？进里边来吧。让我瞧瞧。”

他很客气的让开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又重述一遍，随即把一口乌木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津津有味地端详着那个房间。壁炉台上和妆台上陈列着那么多的玩艺儿和好物件，

都是她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议员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奢华啊！

“坐吧；那边两个椅子上坐吧，”议员先生蔼然可亲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然惶恐，觉得礼貌上不如不坐的好，可是议员先生已经找了东西出来，重新又请她们坐。她们这才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说。

“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葛婆子都很恭顺地回答了。

“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

“六个，”葛婆子说。

“好啊，”他回说，“那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

“是的，先生，”葛婆子回说；她被他那恳切殷勤的态度所感动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你的丈夫做什么行业？”

“他是个玻璃工匠，可是他现在害病。”

谈话之间，珍妮的蔚蓝大眼一径都有兴味地睁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的瞪视和一个依稀恍惚的妩媚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离开她了。

“唔，”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很多——可是欢迎你们洗。下礼拜也许还有。”

说着他就走动起来，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

“您这衣服有一定的日子要吗？”葛婆子说。

“不，”他沉吟着说，“下礼拜哪天都可以。”

她用一句简单的话谢过他，就动身要走。

“让我想想看，”他说着走上一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拿回来吧。”

“好的，先生，”葛婆子说，“谢谢您。”

她们走出门，参议员就又回去看他的书，可是不知怎么的，觉得心境不宁了。

“糟得很，”他盖上了书本说。“这一班人真有令人伤感的地方。”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赏的神情已经弥漫了全室。

葛婆子和珍妮重新走上那阴沉的街道。她们经这一番幸运的冒险，心里感着无限兴奋了。

“他那房间不很漂亮吗？”珍妮低声说。

“是的，”母亲回说；“他是一个阔人呢。”

“他是一个议员不是？”女儿接着说。

“是的。”

“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轻轻地说。

讲到珍妮的精神——谁能够描写它呢？现在正给科伦坡这位阔人收送衣服的贫家女子，生就一种非常柔和的性情，用言语是形容不尽的。原来有一些人的某一种性格，来也不解所以然，去也不问是何故。人生，当这种人还能忍受的时候，便是一种奇异的国土，一件无限美好的东西，只要他们能够怀着惊异的心情飘泊到里面去，那就简直是天堂一般。他们睁开了眼睛，便见一个舒适而完美的世界。树呀，花呀，也有声音的世界，也有色彩的世界。这些，就是他们的国家的宝贵遗产。倘若没有人对于这些东西声明是“我的”，他们就会喜气洋洋的飘泊而前，口中唱的歌儿是全地球的人都有一天希望听到的。这就是善良之歌。

然而关闭在物质的世界里，这样的性情差不多照例要算是有点反常。其他那个曾经织进了骄傲和贪婪的肉的世界，是要对于理想家和梦想家侧目而视的。倘若有人说看云有趣，那回答的话就是告诫他不可闲荡。倘若有人愿意听听风声，这对于他的灵魂固然很好，可是那风声就要夺去他所有的东西。倘若一切所谓无生命的世界用一种非常完美而使人不得了解了的柔和声音将人感召，致使人留恋不舍，那人的肉体就要受害了。实际世界的手永远向这种人伸着——永远要贪婪地擒住这种人。世界上卖身的奴隶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实际的世界里，珍妮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从她的青年期开始，她的每一行为的动机都由善良和慈悲塑造的。如果西巴轩跌坏了，很着急地拚着性命把他平安送到母亲那里去的就是她。如果乔其嚷着肚子饿，她就把她自己所有的面包都给他。她一天要花费许多时间摇她的弟弟妹妹睡觉，该唱歌的时候她就尽情的唱，还要做一些渺茫的梦。自从她会走路的时候起，她就是她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跑差使，喂孩子，哪一样都是她做的事儿。她虽然也常常想起自己命苦，却从来没有人听见她埋怨过一声。她也知道别的女孩子生活比她自由得多，美满得多，可是她从来没有萌起过卑鄙的嫉妒；她心里也许会感到寂寞，嘴里却继续唱歌。天气晴明的日子，她就在厨房里看窗口，渴望去逛逛牧场。自然的美丽曲线和阴影接触着她，她会觉得它简直是一种歌曲。有时候，她也跟乔其他他们一同出去，领他们到一片胡桃树繁生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开旷的田野，上面有舒适的阴影，下面有活水的溪流。她虽然不是一个能把感觉构成概念的艺术家的灵魂可也会对这些东西起反应，每一个声音和每一声叹息，她都会觉得它的美而欢迎它。

每当作为夏季精灵的斑鸠儿从远处发出柔婉呼声的时候，她总侧着脑袋倾听着，那声音的全部精髓就跟银色的水泡一般落进她自己那个伟大的心。

见到太阳和暖而树荫中有它的光辉点缀着的地方，她常喜欢在那里惊叹那种图案，到那金色最浓的地面去散步，并用她本能的鉴赏力去巡行群树间的神圣走廊。

色彩也不会不对她发生影响。傍晚时分充满着西天的那种奇异的光彩，常要感动并且轻松她的心。

“我真不晓得，”她有一次带着女孩子家的傻气说，“飘浮到那些云头里去该有怎样的感觉。”

其时她因发现一株野葡萄藤天然形成的一个圈子，正同马大和乔其坐在里边。

“啊，假使你有一只小船可以坐到那里去，不是有趣吗？”乔其说。

她正抬头看着远处的一朵云头，一片银海里的一块红色的海岛。

“你就想想看，”她说，“假使人们能够住在那么一块海岛上的话。”

她的灵魂早已是在那里了，它那仙境的路径已认识她的轻盈的脚步。

“那边一只蜜蜂飞去了，”正在注意一个大蜜蜂飞过的乔其说。

“是的，”她象做梦似地说，“它是回家去的。”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家吗？”马大问。

“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的，”她回答。

“鸟儿也要回家吗？”乔其问。

“是的，”她说，也深深感觉到这里面的诗意，“鸟儿也要回家的。”

“蜜蜂也要回家吗？”马大问。

“是的，蜜蜂也要回家的。”

“狗要回家吗？”乔其看见近旁路上一只寂寞独行的狗，就这样问。

“怎么，当然咯，”她说，“你也知道狗要回家的。”

“牛蝇呢？”他看见那微弱的阳光里有那一阵阵的小昆虫正在努力回旋，就又硬要问下去。

“是的，”她说虽这么说，可只一半相信她自己的话。“听啊！”

“哦哦，”乔其显出不信的样子嚷道，“我想不出它们住在怎么样的房子里。”

“听啊！”她又说了一遍，一面摆摆手叫他不要作声。

这时正是一天中静谧时刻，晚祷的钟声如同祝福一般落在垂暮的天空。遥远处，种种音调一齐柔和地响出，“自然”因她在倾听，似乎也已停止活动了。一只胸部猩红的知更雀在她面前草地上小步跳跃着。一个蜜蜂营营的叫，一个牧牛铃丁当的鸣，同时有一种可疑的悉索声，报告一只松鼠正在秘密侦察。她把她的美手继续擎在空中，侧着耳朵倾听着，一直听到那些柔和的音调疏散稀微，使她的心不复能把捉为止。她这才站了起来。

“啊，”她感觉到一阵诗的伤感，捏紧了手指叹出这一声。随即有晶莹的眼泪从她眼睛里泛滥出来。她心里的汪洋情海已经冲破它的堤岸了。珍妮的精神就是这样的。

三

青年参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是一个特殊模型的男子。在他身上以显著程度混合着机会主义者的智慧和真正人民代表的同情心。他生在南部的俄亥俄州，除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两年法律外，是在本州长大和受教育的。他熟悉民刑法律，也许不在州内任何人之下，但是他从来没有下苦功去实地应用他的知识，所以在律师界并没有卓越的成绩。他也赚过一点钱，而且如果他肯昧良心的话，原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多赚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他始终不干。不过他的操守也还不能杜绝对朋友的徇情。就在上次的总统选举，他曾支持一个人当选州长，而那个人是他明知道良心上断断不能支持的。

还有几次官吏的任命，他都很有嫌疑，有一两次干得简直不象话。每当良心刺激得他过于尖锐的时候，他就用“我一生中只不过这点劣迹”一句话来自安自慰。他有时独自坐在安乐椅上，把这些事情想过一番，就念着这一句话，站起身来，露出一一种羞惭的微笑。在他身上，良心是无论如何没有死的。至于他的同情心，更是一天强似一天了。

科伦坡是他的选举区的一部分，他在这个选举区里曾经三次当选为众议员，两次当选为参议员。可是他至今还是独身。在他青年的时期，他曾经有过一度热烈的恋爱，但是终于一场没结果。这倒并不是他的过失，而是由于那个女子觉得不便再等他。他要造就一个能够维持生活的资格，时间拖得太久了。

他生得魁梧而挺拔，不胖也不瘦，可以算得是相貌堂堂。他受过种种打击，吃过许多亏，因而外貌上带着一种神气，能够唤起那些富于想象的人的同情。人家都觉得他天生是和蔼可亲的，他的参议院的同僚们，也觉得他内才并不高明，外貌却还漂亮。

此番他到科伦坡来，为的是他的政治的屏障需要悉心的修理。这次普通选举，已经把他那一党在州议会里的势力削弱了。他想要重新当选，原也还有足够的票数，可是需要极审慎的政治手腕才能把它们拉拢来。别人也有野心的。除他之外相当有希望的候选议员还有半打之数，谁都有心要取而代之。因此他见到形势严重了。不过他心里想，他们是打他不倒的，而且即使打倒他，他也一定可以运动总统给他一个驻外的使节。

总之，参议员白兰德是算得一个成功的人物了，可是他总觉得有一种缺憾。他生平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如今他已经五十二岁，虽然纯洁无暇，体面而杰出，却依然是个独身。有时他不禁要环顾四周，而想起了没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处境。有时他的房间显得异常的空虚，连他自己这个人也似乎是非常可厌了。

“五十了！”他常常这样想。“孤独——绝对的孤独。”

那天礼拜六的下午，他在房间里坐着，忽然听见打门的声音。那时他正在冥想人生和名誉之无常，而感觉到他的政治活动之徒耗心力。

“我们为着要维持自己，得费多大的力气去奋斗啊？”他想。“从此再过几年，这种奋斗还能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他站起身，把门大开着，一看是珍妮。她所以不等下礼拜一，今天就来，为的是她对母亲说过，要给人家一个好印象，觉得她们做事很迅速。

“进来吧，”参议员说；他也同上次一样，蔼然可亲地让路给她。

珍妮踱进门，心里期待着一句称赞她洗衣迅速的话。可是那参议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个。

“哦，我的姑娘，”他当她放下衣包的时候说，“你今晚好？”

“很好，”珍妮回说。“我们想不如把衣裳早点儿给您送来，不等礼拜一。”

“哦，那没有关系，”白兰德不当要紧地回说。“放在椅子上吧。”

珍妮没有想到她还没有拿到洗衣服的工钱，就想走出去，可是参议员留住她。

“你的母亲好啊？”他欣然地问。

“她很好，”珍妮简单他说。

“你的小妹妹呢？她好一点儿了吗？”

“医生想是好一点儿了，”她回说。

“坐坐，”他凛然地接着说。“我要同你谈谈。”

那青年女子走到近旁一张椅子去坐了下来。

“唔，”他轻轻的清一清喉咙接着说。“她是什么病？”

“出疹子，”珍妮回说。“我们前几天都当她是要死了。”

白兰德趁她说这句话时，细细端详她的脸，觉得从那上面可以看出一种非常令人伤感的東西。那女子的褴褛衣服，和她羡慕他生活舒服的那种神情，使他感动了。他几乎觉得周围的一切舒适和奢侈都是可耻的。他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诚然是高了！

“她好些了，我很高兴，”他好心地說。“你的父亲几岁了？”

“五十七。”

“他也好些了吗？”

“啊，是的，先生；他有些儿起色了，可是还不能出门。”

“我记得你母亲说他是個玻璃工匠不是？”

“是的，先生。”

本地这种工业之不景气，是他所深知的。上次的选举运动，这也就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那末他们的景况真是不堪了。

“你家的孩子都上学吗？”他问。

“怎么，是——是的，先生，”珍妮口吃着回答。她家里原有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鞋子不能够上学，可是她觉得太不好意思招认出来。现在说出这一句假话，使她心里很难受。

他默想了一会儿，这才觉得没有理由可以再把她留住，就站起来，走过她这边。他从口袋里掏出薄薄儿的一叠钞票，揭了一张交给她。

“你拿去，”他说，“告诉你母亲，说我说的，拿它做什么花费都行。”

珍妮带着混杂的感情接过钱来；她竟不曾想起去看看那是几元的钞票，这个伟大人物这么贴近她的身，他所住的这个奇异的房间又这么惹眼，她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谢谢您，”她说。“您有一定的日子要我们来取衣服吗？”

“哦，是的，”他回答；“礼拜一——礼拜一的晚上。”

她走了，他象出神似地把房门关上。他对于这一班人的兴趣是异乎寻常的。贫穷和美确乎成为一种动人的结合了。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专心于她这一来所引起的愉快的冥想。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帮帮她们呢？

“我要去寻出她们的住处，”他最后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以后，珍妮就常常来取衣服。白兰德觉得自己对于她的兴趣一天浓似一天，而且经过相当时期之后，他竟能使她去掉她同他见面时要觉得不舒适的那点羞怯和恐惧了。有一桩事情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他叫她的小名。这是她第三次来的时候开始的，此后就不知不觉的这么叫惯了。

他这样叫她的小名，不能说是由于他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因为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难得有这样的态度的。他跟这个女子谈话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又常常猜想她也许也能觉察并且赏识他这年轻的一面。

至于珍妮，她是被这个人周围的舒适和奢侈所迷惑了，并且下意识地被这个人的本身所迷惑了，因为她生平见过的人，要算他最有吸引力。他所有的东西样样都是好的，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是文雅的，出色的，周到的。从

一种遥远的来源——也许从她的日耳曼祖先身上，——她承袭了一种对于这一些东西的理解力和赏识力。生活是应该象他那样生活的，其中特别使她赏识的就是他那种慷慨的精神。

她的这种态度，一部分是从她的母亲那里得来的，因为在她母亲的心灵里，同情常比理性有力量。例如她把那十块钱交给她的时候，那葛婆子竟乐得出了神。

“哦，”珍妮说，“我走出了门口才知道有这么多呢。他叫我把这交给你。”

葛婆子接了过去，把它轻轻夹在两只合叠的手中，当即分明看见那魁梧的参议员的漂亮影子在她面前了。

“他是多么漂亮的人啊！”她说。“他心眼儿太好了。”

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葛婆子都不住赞美这一棵珍奇的摇钱树，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做人不知该有多么的好，心肠不知该有多么的宽宏。替他洗衣服的时候，她差不多把衣服都擦烂了，只觉得她无论怎样用力，也是报他不尽的。这桩事儿她可不让老头子知道。因为葛哈德有种固执的脾气，虽然在困苦之中，也决不愿意无功而受禄，所以要他收下这笔钱，她一定得费点事儿。因此她一句不提，只用它来买面包买肉，仍旧非常刻苦地过日子，使他不致觉察这笔意外的横财。

从此以后，珍妮就把她母亲的这种态度反映到参议员身上去，心里既然非常感激他，说话也比以前随便些了。后来他俩搞到很要好，他竟把橱柜里一个皮革做的相片框子送给她，因为他看出她很欢喜。她每次来的时候，他总借故留她一会儿，后来不久，就发见她那温柔的处女性里深深埋藏着一种厌恶贫穷的意识和一种不肯向人诉苦的羞惭。他诚心地喜欢她的这一点，又见她衣服褴褛，鞋子破烂，恨不能够想出一种不致得罪她的法子来帮助她。

他常常想找一个晚上跟她回家去，亲自去看看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是一个合众国的参议员呢。她们住的那一带地方一定是很贫苦的。想到这里，他就得考虑一下，慎重的办法暂占优势。结果是，这个探访的计划终于搁起了。

十二月初头，白兰德回到华盛顿去住三个礼拜，有一天葛婆子和珍妮知道他走了，大家都吃了一惊。他每礼拜给她们的洗衣钱，没有少过两块，有几次还给她们五块。他的这一走，也许没有想到对于她们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吧。可也没有法子；她们只得熬过日子去。葛哈德的病好些了，曾经到各工厂去找过工作，结果是一无所获，这才弄到一个锯木架和一柄锯子，挨门逐户去找锯木头的活儿。这种活儿并不多，可是他拚命的干，一个礼拜也弄到两块乃至三块钱的收入。把这收入补凑他老婆和西巴轩挣来的钱，已经够他们有面包可吃，可也只够吃面包罢了。

及到快乐的圣诞节开头，他们才深深感觉到穷苦的难受。德国人是喜欢在圣诞节铺排场面的。这是一年之中他们那个大家庭的感情能够充分表现的时节。他们看重儿童时代的快乐，所以喜欢看孩子们享受他们的玩物和游戏。老头子在圣诞前的一礼拜，手里锯着木头，心里就常常想到这桩事。小味罗尼加病了这么久，什么不该买给她呢！他巴不得每个孩子都给一双结实的鞋子，外加男的各人一顶暖和的便帽，女的各人一顶美丽的风兜。玩物，游戏，和糖果，他们以前是常常有的。想起下雪的圣诞早晨，家中桌子上头没有满满堆着使孩子们称心如意的物件，他就觉得痛心了。

至于葛婆子心中的感情，那是与其形容它，不如想象它的好。她感到非常痛楚，不敢去跟老头子谈起那个可怕的时节。她曾经贮起三块钱，希望去买一吨煤来，免得可怜的乔其天天去偷，可是现在圣诞节将近，她就决计用来买恩物了。老头子也私下积起两块钱，不让老婆知道，心想等圣诞夜里，到了紧要关头才拿出来，借以宽慰那做母亲的心中的焦急。

但是到了圣诞节那天，却很难说他们得到了什么安慰。整个城市都充满着节日的气氛了。杂货店和肉食店都扎着冬青树。玩具店和糖果店都摆设得满目琳琅，色色齐备，每个体面人家的圣诞老公公都要带几样回去的。他家的父母和孩子也都看见了，却使前者感觉到了需要和焦急，后者萌起了胡乱的幻想和不能完全压制下去的希求。

葛哈德曾经当着他们面前屡次说起。

“今年圣诞老公公穷得很。他没有很多东西可以送给我们。”

可是孩子们虽然贫苦，却没有一个肯相信他。他每次说了这句话，就向他们眼睛里看看，看出他们虽然受到了警告，眼睛里冒出来的希望可并没有减少。

圣诞那天是礼拜二，前一天礼拜一就放学了。葛婆子动身到旅馆之先，吩咐乔其要多捡些煤回来，以便维持过圣诞日。乔其立刻就带他的两个妹妹前去了，可是没法可以多捡，要费好大工夫才能装满他们的篮子，所以直到夜里，他们只不过捡了一点点儿。

“你去捡煤没有？”葛婆子晚上从旅馆回来，第一句就问这话。

“去过了，”乔其说。

“够明天用吗？”

“是的，”他回答，“我想总够了。”

“好吧，我去看看，”她说。他们就拿了灯，一同到放煤的木棚里去。

“啊，我的天！”她看了看就这么嚷道；“还差的远呢。你得马上再捡去。”

“哦，”乔其撅着嘴说，“我不去了。叫巴斯去吧。”

巴斯六点一刻就回家来了，当时正在后房里洗脸穿衣，预备要到城里去。

“不行，”葛婆子说。“巴斯忙了一天了。还得你去。”

“我不去，”乔其仍旧撅着嘴。

“好吧，”葛婆子说，“你明儿没有火生，看你怎么办？”

他们回到屋子里，乔其受到良心的刺激，觉得事情不能就此僵下去。

“巴斯，你也来，”他叫他那正在里房的哥哥。

“上哪儿去？”巴斯说。

“去拿点煤来。”18

“不行，”他的哥哥说，“不行。你把我当什么人看了？”

“好吧，那末我不去，”乔其把头一翘说。

“今天下午你干吗不去拿？”他哥哥厉声地问；“你是整天闲着的。”

“哦，我去拿过了，”乔其说。“我们找不着多少呀。没有煤叫我拿什么呢？”

“我想你没有用心找吧，”那个花花公子说。

“怎么回事？”刚替母亲到杂货店去了回来的珍妮看见乔其撅嘴，就这么问。

“哦，巴斯不肯捡煤去！”

“你下午没有去拿吗？”

“去过的，”乔其说，“可是妈说我拿的还不够。”

“我同你去，”他的姐姐说。“巴斯，你愿意去吗？”

“不，”那青年毫不在意的说，“我不去。”他正在弄整领带，觉得有些恼怒了。

“没有煤好捡啊，”乔其说，“除非我们打煤车里去拿去。我去的那个地方可连煤车也没有。”

“那个地方也有煤车的，”巴斯嚷道。

“没有的，”乔其说。

“哦，别闹了，”珍妮说。“拿篮子来我们马上去，别等太晚了。”

其他的孩子都喜欢他们的大姐；大家就把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味罗尼加拿一只小篮子、马大和威廉拿桶子，乔其拿一个洗衣服的大篮子，打算同珍妮捡满了，两个人抬回家来。巴斯看见珍妮这样热心，有些过意不去，而且他仍旧有些看得起她，现在也替他们出主意。

“我告诉你怎么办，珍，”他说。“你带孩子们到八条街，在那些车子旁边等着。过一会儿我也来。我来的时候，你们谁都别当认识我。你们只说，‘先生，您肯替我们扔一点煤下来吗？’那时我就爬上煤车，多扔些下来让你们装满篮子。你们懂得吗？”

“好的，”珍妮很高兴的说。

他们进入了雪夜，向铁路的轨道行进。在街道和宽阔的铁路站场交叉的地方，有许多辆装满烟煤的车子新近停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聚在一辆车的荫底下。他们正在那里等待哥哥到来的时候，华盛顿的特别快车开到了。那是一串美丽的长列车，里面有几节新式的客座，大玻璃窗亮晶晶的，旅客们躺在舒适的椅子上向窗外浏览。列车隆隆地驶过，孩子们都本能地向后退却。

“哦，这不很长吗？”乔其说。

“我可不喜欢做司机人，”威廉说。

只有珍妮一个人默默不响，但是对于她，旅行和舒适的暗示特别有力量。有钱人的生活该够多么美丽啊！

这时西巴轩在一段路外出现了，神气活现的大踏步走着，显得他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他的脾气是特别顽强而且固执的，倘若那时孩子们没有依照他的计划做，他竟会佯为不知地走过去，不肯给他们帮忙。

可是马大采取当时应有的办法，当即孩子气地嚷了出来，“先生，您肯替我们扔一点煤下来吗？”

西巴轩突然停步，把他们细细一看，好象真的同他们一点都不相识的样子，喊道，“可以，可以，”随即爬上了那辆煤车，从那上面极迅速地扔下许多煤块，一会儿就够装满他们的篮子了。然后他又装作不愿在这贫民队里耽搁太久的样子，急忙走过那蜘蛛网似的轨道，不见了。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又遇着一个绅士（这回却是真的了），戴着高帽子，穿着坎肩式的大衣，珍妮立刻就认出他了。原来他不是别个，正是那体面的参议员，刚从华盛顿回来，准备要过一个很无聊的圣诞节。他就是刚才惹起孩子们注意的那一列快车里来的，现在提着他的轻提箱，当好玩似的步行到旅馆里去。当他走过的时候，他好象也认识珍妮。

“是你吗，珍妮？”他说着，就站住了细认一认。

珍妮却比他认识得快，嚷道，“哦，那是白兰德先生！”她就丢开抬着的篮子，示意叫孩子们一径拿回家，自己却向对面的方向急忙跑去。

那参议员跟着她，喊了三四声“珍妮！珍妮！”她总是不应。后来看看无法追上她，并且突然的明白过来，要顾到她那单纯的女孩子家的羞耻，他就停住步，回转身，决计跟孩子们一道去。那时候，他又发生向来同珍妮接近的那种感觉，觉得她的身分和自己的身分实相悬殊。他看见孩子们正在捡煤，方才觉得做参议员是有些意思的。明天这个快乐的假日，在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同情地步行前去，不期脚步上感到一种轻快，一会儿就看见孩子们进入一座矮屋门中了。他跨过了街心，到一些雪盖的树的稀薄阴影里去站着。屋后一个窗子里有黄橙橙的灯光。四周尽是皑皑的白雪。他能听见木棚里孩子们的声音，有一会儿他又仿佛看见葛婆子的影子。过了一会，他看见一个依稀的人影穿过了一个旁门。他认识那是谁的影子，不由心里怦怦跳起来，当即咬紧了嘴唇，压住过分流露的情绪，

然后使劲转过了身子，走开了。

城里的头号杂货店，是个名叫曼宁的开的，他是白兰德的忠实信徒，且以得跟参议员结识为光荣的。当天晚上，白兰德到这人正在忙碌的写字台边去。

“曼宁，”他说，“今晚上你肯替我做一点小事吗？”

“怎么，那还用说得？议员先生，那还用说得？”杂货店的掌柜说。

“您多咱回来的？惦记得很！那还用说得？”

“我请你把一家八口人家过圣诞节应用的东西都配齐全，要丰盛些——他家里是父亲，母亲，和六个孩子——圣诞树，杂货和玩艺儿——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一准，一准，议员先生。”

“你甭问多少钱。每样都要多多的。我给个地址给你，”说着，掏出一本笔记簿来写地址。

“怎么，我乐意得很，议员先生，”曼宁接着说；他自己也很感动了。

“我乐意得很。您向来是慷慨的。”

“你听我说，曼宁，”白兰德只为不得不维持参议员的尊严，所以很严肃地说。“把所有的东西即刻就送去，帐单子送来给我。”

“乐意得很，乐意得很，”这就是那受惊而心许的杂货店老板所仅能说的话了。

参议员走出店门，才记起了他们两老，就去找估衣店和鞋子店，却因不晓得尺寸，所以言明定买的各件都可以退换。及到这些工作都做完，这才回到自己房里去。

“捡煤呢，”他把这一点想了又想。“我真是太卤莽了。我应当不再忘记他们。”

四

珍妮看见参议员所以要逃，无非是因她觉得自己处境的可耻。她想他这般看得起她，却发现她做这样不相干的事，觉得很难为情。她到底还是女孩子脾气，以为他对她的兴趣一定另有所属，不单在她的人物上。她到家的时

候，葛婆子已经听见其他孩子说起她先逃的事儿了。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进来的时候乔其就问她。

“哦，没有什么事，”她回答，但她立刻对她母亲说，“白兰德先生路上走过看见我们了。”

“哦，是吗？”她母亲轻轻的嚷道。“那末他已经回来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跑呢，你这傻孩子？”

“这个吗，我不要他看见我嘛。”

“哦，也许他还没有认识你呢，”她对女儿的为难处表示同情。

“哦，他已经认识我了，”珍妮低声说。“他还叫过我两三遍呢。”

葛婆子摇摇她的头。

“什么事情？”在里边房间里听见她们说话的葛哈德现在走出来说道。

“没有什么，”母亲说；她不愿意说明参议员在他们生活上的意义。

“他们捡煤的时候有个人吓唬他们啦。”

入夜之后圣诞的礼物送来，引起全家人一阵兴奋的哗噪。当一辆杂货店的送货车停在他们的矮屋门前和一个壮健的伙计开始搬进礼物的时候，老夫妻俩是谁都以为自己眼睛看错了。他们对伙计说他送错了，伙计可不听，于是那么些好东西都被他们欢天喜地的一一过目了。

“你们放心好啦，”这是那伙计一本正经说的话。“我是不会错的。葛哈德，不是吗？那末正是给你们。”

葛婆子脚步不停，兴奋得只会搓手，并且偶尔发出一声，“好吧，现在不是好了吗？”

老头子看见这个不知名的施主如此慷慨，也不由得不软化了。他以为这是本地某大工厂的主人送他的，因为他跟他相识，并且待他们很好。葛婆子感激涕零的，对于这个来源的猜测有些怀疑，可是她不说什么，至于珍妮，她是本能地明白这桩事是谁做的。

圣诞第二天的下午，白兰德在旅馆里遇见珍妮的母亲，因为那天珍妮在家里看家。

“你好啊，葛奶奶，”他伸着手欣然喊道。“圣诞节过得快活吧？”

可怜的葛婆子颤抖抖地接了他的手，眼睛里立刻充满眼泪了。

“怎么，怎么，”他拍拍她的肩膀说。“别哭啊。不要忘记今天得来拿衣服。”

“哦，不会忘记的，先生，”她回说。她本来再要和他谈几句，可是他走开了。

从此以后，葛哈德就常常听见她们谈起旅馆里有个漂亮的议员，为人怎么怎么和气，给她们的洗衣钱怎么怎么多。德国劳动者的脑筋是简单的，所以他很容易相信这位白兰德先生一定是个很伟大而且很好的人。

珍妮的感情是无须向这方面加以鼓励的，所以她对于他的好感是有了偏心的了。

她那时正在成年，模样身段儿渐臻丰满，任何男子都不能不受她的吸引。原来她的体格本来就结实，身材也很高，不象一个女孩子。倘使叫她穿上时髦女人的长裙，她就尽可做得那参议员那么高个儿的伴侣。她的眼睛清澈光亮得出奇，她的皮肤很娇嫩，她的牙齿洁白而匀整。她又很聪明，很灵敏，而且并不缺乏观察力。她所缺乏的只是训练，只是自信心，那是因她知道她自己必须完全依靠别人才丧失了的。但是她得常常出外送衣服，又差不多